

# 语文课要“减肥”“消肿”

□温儒敏

我和梁增红老师未曾谋面,他寄来书稿,邀我作序,一时未敢承命,但看到《简洁语文教学的守望与探索》这个书名,阅读兴趣就来了。细加拜读,激发许多思绪。

该书开宗明义指出,现在有些语文课“迷失了方向”。他批评说,有些老师“把注意力放在了语文课以外的各种活动上,语文课逐渐式微,买椟还珠,语文课堂教学是伴娘拐着新郎跑。繁花似锦的形式如雨后春笋,什么课前三分钟演讲,什么拓展延伸,什么课本剧表演,什么语文综合活动,吹拉弹唱进课堂,声光电齐上武装到牙齿,一时满目生机盎然,一派欣欣向荣。可是,妖艳无比的打扮,却没有改变语文教学令人尴尬的处境。”梁老师把这些现象归纳为“外延无限延伸,内涵不断虚脱”。批评很尖锐,但恐怕不无现实所指。不久前,我在河南、山东和北京先后听了几堂课,包括有些“公开课”,程度不同地存在梁老师批评的这些“繁琐病”。所以,梁老师主张要回到语文本身,让语文课简洁,我很赞成。

其实,除了梁老师指出的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繁琐”,还有另一种“繁琐”,大家也是见得多的,那就是:无论精读、略读,也不管文体、内容,全都有一套几乎固定的程式去套解,诸如背景介绍、字词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表现手法等等,通常都是把课文“大卸八块”,进行僵化的“满堂灌”,然后就是题海战术,反复操练,应对考试。这种陈陈相因、繁复琐碎的语文课实在是折磨人,把鲜活的语文弄得面目可憎,学生也就被败坏了胃口,毫无兴趣。所以,修订后的语文课程标准才提出要建立“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课程,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充分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神,关注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可是,这种应试式的教学,在新课程实施之前很普遍,之后呢,也还是司空见惯。改革不容易呀。无论是由来已久的“程式僵化”,还是近年来新出现的那种“内涵虚脱”,共同的病症都是“繁琐”。梁老师提出的“简洁语文”,对两种“繁琐”都有针砭意义。

不过,对现有的语文教学的“繁琐病”,也还是要有“了解之同情”。其病因主要在社会,是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对优势教育资源几乎“惨烈”的争夺,造成普遍的焦虑与浮躁。语文教学上的那种应试式的繁琐,归根结底也是源于实用主义的“时代病”。当高考和中考的分数排名事实上仍然作为教学业绩硬指标的时候,“应试式的繁琐”就难以去除。因此,“繁琐病”的存在不能全怪老师,现在社会上有太多对语文教学的抱怨,这并不公平。人人抱怨,又人人参与,能不焦虑、繁琐?

当然,作为老师,我们又不妨换个角度来想想:如果应试教育大环境未能根本改变,难道就坐以待毙?就放任语文课被“繁琐病”所缠绕?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其实外界压力再大,总还有自己的空间,我们不指望能改“一丈”,那就实实在在去改“一寸”好了。我曾主张课改和高考“相生相克”,老师要懂得一些“平衡”,努力做到既能让学生考得好,又不把他们的脑子搞死、兴趣搞没。看来,对那种僵化而繁琐的应试式教学,是应当也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关键是“有心情,有责任感”。

至于那种追求形式主义的“繁琐病”,同样也是心态浮躁的表现:未能

正确理解和运用新课程的要求,在显示“课改”,却走了歪路;或者因为环境所迫,比如受制于某些检查评比,要追求“课改”的气氛,却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梁老师书中对此多有批评。他尤其反感那种空洞的“大语文”,认为“大语文”错就错在漫无边际、天马行空,有时我们出发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忘记了语文课的初衷。所以他提出语文课要“消肿”、“减肥”、“瘦身”,要上干净洗练的语文课,着眼语文,着力语文,直奔语文教学的核心。少一些浪费时间的插科打诨,少一些非语文的左顾右盼,少一些无聊肤浅的机械重复,要努力做到教学目标明确、方法有效、形式活泼,学生参与度高,练习精致扎实。

我理解,一些专家和老师提倡“大语文”,也是为了改变语文教学被应试教育捆绑而过于僵化的状况,希望语文课更贴近生活,更生动活泼,并能往课外延伸,激发阅读兴趣。“大语文”的初衷没有错,只是如果被形式主义牵引过了头,就会出现空洞化的问题。“大语文”如果空洞化了,当然要警惕,也应当批评,但不要全盘否定。把“大语文”的贴近生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性以及拓展阅读等合理的、科学的因素保留吸收,又坚持语文课的简洁扎实,两相结合,岂不更好?我们总不能摒弃了“大语文”的“空”,绕个圈,又回到原先僵化狭窄的境地。

“简洁语文”并非新主张,但梁老师在当前提出,有特别的意义。梁老师是一线的语文老师,他用自己的实践去证明“简洁语文”的好处和魅力。这本书中除了问题的讨论,还有许多教学的案例分析,也都是值得参考的。

“简洁”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艺术。语文课如何做到简洁?梁老师有他的坚持,书中也有多种方法的展示。我为他“点赞”。读梁老师的书我心有戚戚焉,不禁想起自己最近在一次评课时说过的两段话,这里引用一下,作为对梁老师“简洁语文”的支持,同时也向读者诸君求教,看如何让语文课变得“简洁”。

一段话是主张语文课要聚焦“语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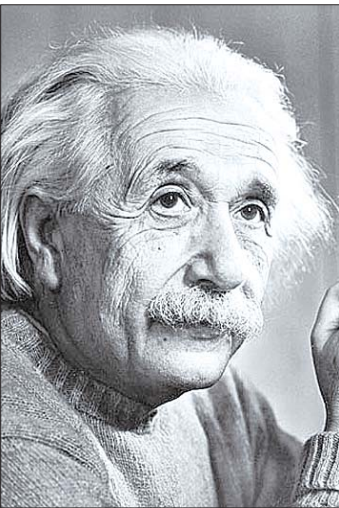
“语用”就是语言文字运用,这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语文课的目标可以罗列很多,包括人文教育、传统文化熏陶,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等等,但核心是什么?基本目标是什么?就是语言文字运用。语文课,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课,同时把文化修养呀、精神熏陶呀,很自然地带进来。“语用”和其他几方面是自然融合的,不是一加一或一加几的关系。有些老师备课,要罗列哪些属于工具性、哪些属于人文性,割裂了,没有这个必要。

有“聚焦”,语文课才有主心骨,也才能克服焦虑和繁琐。第二段话,是建议语文课少用或者不用多媒体,其意图也在于驱除虚浮的形式主义:

现在的语文课不断穿插使用多媒体,虽然很直观,可是把课文讲解与阅读切割得零碎了。多媒体给学生提供了各种画面、音响与文字,目迷五色,课堂好像活跃了,可是学生的阅读被挤压了,文字的感受与想象给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这样的多媒体对语文学习并没有好处。

要让语文课“简洁”而且“高效”,老师们肯定还有没有办法,我贡献给大家这两个建议,不知是否管用?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科学世界】

# 人们为何对爱因斯坦的大脑如此着迷

□文双春

1955年4月18日凌晨1点15分,7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人世。爱因斯坦生前有遗嘱:身体火化,骨灰撒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地方。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希望死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既不要求一次性地发讣告、搞葬礼,更不希望永久性地修坟墓、立墓碑。爱因斯坦之所以这样做,据说并不是因为他老人家要体现高风亮节,更不是因为他有才就任性,而是因为他老人家对“崇拜”恨之入骨。他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顶尖科学家,首先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会,那就是崇拜是科学的大敌,其次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憎恨,那就是崇拜不仅搞得被崇拜者很不舒服,更会助长不公平的“恶习”。

爱因斯坦的遗愿能实现吗?《支离破碎:名人尸体的奇怪命运》一书作者Bess Lovejoy讲了一个故事。60年前的一个人间四月天,发生了一起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盗窃事件,盗窃的目标不是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或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而是爱因斯坦的脑袋。“窃贼”先用一把骨头锯子锯开爱因斯坦的头盖,然后用一把凿子撬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大脑,然后,你懂的,与所有的“窃贼”一样,他把“赃物”捎回了家,藏在了自己的家里。

随后的故事众所周知,爱因斯坦至今仍身首阴阳两界:他的身子被火化了,骨灰倒是遵照他的遗愿撒在了特拉华河上的一个秘密地点,但他的大脑却留在了人世间,被解剖,被研究,被放在医学博物馆展出。

那个“窃贼”名叫托马斯·哈维,是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他负责解剖爱因斯坦遗体——找出了爱因斯坦的死因是主动脉破裂。哈维摘下爱因斯坦的脑袋并据为己有,这种行为被定性为“窃”,是因为没有得到爱因斯坦及其家人的许可。

哈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了很多辩解,理由听起来就像孔乙己的名言“窃书不算偷”:首先,“窃”的动机是高尚的——希望可以用爱因斯坦的脑袋解开一些宇宙中最神秘的奥秘;其次,这么做并非完全非同寻常——那时医院经常在没有得到死者或其家属明确许可的情况下,移除有趣或不寻常的器官作研究;最后,正如哈维经常挂在嘴边的,爱因斯坦的家人是给了解剖许可的——但即便如此,人家也没有许可你摘掉脑袋并据为己有呀,听听哈维如何狡辩——而在做尸体解剖检查时大脑往往要被移除的。

哈维显然是在瞎床咄鼻、强词夺理。爱因斯坦的家人除了无可奈何,唯有提点要求:爱因斯坦的大脑只能严格限于科学研究,且研究结果只能发表在有品位的学术期刊上。

哈维本人并不是出色的脑科学家,所以他摘下并保留爱因斯坦大脑的“高尚动机”不足为信,他应该把爱因斯坦的大脑奉献给脑科学家或专业的脑科研机构才算合情合理。但哈维辩解,在与爱因斯坦家人争吵后,他不敢把大脑切片给其他科学家。就这样,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直躺在哈维的房间里,在哈维莫名其妙遭解雇后,又被用一种叫做珂珉珉的类似塑料的材料包着,并被分成1000多片和块,陪伴哈维浪迹天涯,从新泽西到堪萨斯,然后到密苏里,再回到新泽西。

种种迹象表明,对爱因斯坦大脑痴迷的远不止哈维一个人,这从哈维一直遭到外界压力逼迫他交出爱因斯坦大脑可见一斑。哈维迫于压力,后来陆续捐出了一些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或切

齐鲁晚报

随笔

星期三

2015.5.13

B05-B08

青末了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